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四期 ——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7d)

【回首文革】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下)	苏双碧
【书刊评论】	深邃的《迷冬》——一个时代和它的人物	赵 诚
【千秋功罪】	恩来其人——命运、性格与文革	白 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下)

• 苏双碧 •

第二天，我来到市委大楼三层的一个大办公室，由李琪主持的批判邓拓写作小组就集中在这里，一共五六个人，具体召集人是谁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集中时，每人发一份白头本的《三家村札记》和一本《燕山夜话》，这些人大多是过去为这两本书叫好的，而今却必须在这两本书中挑毛病找问题。所以，布置时，召集人强调要带着问题读书，即站在批判者的立场找问题。采取的办法，先是每人写批判文章，等市委统一部署再写大文章。在我的印象中，大家都还是认真的。反正不论过去对邓拓有多少感情因素，今天批邓拓是市委的部署，必须执行。但议论的结果，不外是《一个鸡蛋家当》、《专治健忘症》、《为李三才辩护》、《伟大的空话》等等，这些文章比较容易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也比较容易上纲。可是在分析这些文章的问题时，必须上纲上线才能看出问题的实质。比如《专治健忘症》必须上纲到影射某某领导人，而《为李三才辩护》，必须上纲到李三才是影射彭德怀，只有这样才能把邓拓置于胆大包天攻击伟大领袖的份上。这样一来，经过上纲上线，邓拓的问题就变得触目惊心了。于是写作组的大部分成员，又感到有点于心不忍了，觉得邓拓是不会有意识攻击党中央的领导人的，这样上纲似乎不妥。可是，如果不把《专治健忘症》说成是针对某些大人物的，那么，一篇治病的杂文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为李三才辩护》，如果不把李三才的兵部尚书理解成国防部长，又怎么能和彭德怀挂钩呢？写作组几个人每天就这样扯皮，不知扯了多少天，反正，每一个人都写了一篇或几篇文

章，记得我也交了一篇，是批评邓拓的《谁最早发现美洲》和《扶桑小考》的，不同意把中国人说成是最先发现美洲，也不同意把扶桑说成是墨西哥。因为邓拓发表了前一篇文章后，北大一位教授曾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觉得北大教授讲得更有道理，就写了一篇小文章批评邓拓使用史料各取所需，不够严肃。文章交上去后，很快打出清样。后来我听到对这篇小文的批评，说是没有感情，宣传部的支部书记更是一针见血，说我的感情不在她们一边，言下之意是感情在邓拓一边。

尽管批邓拓写作组的写作慢吞吞，或不疼不痒地进行着，但到了二月中旬，社会上对吴晗的批判一直在升级，从批《海瑞罢官》到批《海瑞骂皇帝》，口诛笔伐，吴晗成了全国一切坏东西的代言人，甚至社会上的小偷、卖淫也是受这位明史专家影响才存在的。吴晗的秘书郭星华就对我说过，在农村中抓到小偷，批斗时，说是受吴晗影响，批评女人有作风问题，也说成是受吴晗影响。作为历史学会，曾经是吴晗组织学术讨论、普及历史知识的据点，历史学会没有一个态度怎么行，于是，市委决定以历史学会名义组织一次批判吴晗的活动。但当时三个学会都已经宣布停止活动。历史学会这次会议市委看得很重，由李琪出面，召开了首都七个高等学校，即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以及市委党校的领导同志，即各校的副校长或常务副书记开了一个预备会，由李琪作部署，说明历史学会召开这次会议的必要性，以及吴晗问题的严重性。

会议在市委党校召开，我作为具体工作人员，奉李琪之命去组织这次会议。既然是历史学会批判吴晗，当然是学会的会员参加更好些。因此，我在提供与会者名单时，认为参加会议的人最好是了解些情况的，尽可能多来几位教授，目的是想提高一下会议的规格。开会那天，来人并不太踊跃，原订四十人上下的会才来了二十多人。会议本来由副会长邵循正主持，他临时身体不适没有来，改由秘书长许师谦主持。一开始，许师谦讲了开场白，他说：“吴晗先生的为人大家都很清楚，如今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他心情也很沉重，他欢迎到会的同志，对他提出批评，他表示一定虚心接受。”这个开场白，定了会议的基调，这些与会者，大多是奉命来的，听许师谦的话音，说是给吴晗提意见，气氛自然轻松多了。况且，许多人确实不知道应该批判些什么，就鸡毛蒜皮地谈了很多，什么历史学会的理事名额分配不公呀，不重视对中学历史教师的培养，讲历史人物评价，如海瑞、武则天、曹操等等，都不讲阶级斗争等等，会开得很零乱，是一次很不成功的批判会。但其中有一位教授的发言，却使我震惊，他揭发了第二届年会出版论文集时，他的文章不愿意收入论文集，吴晗催他几次，要他交稿，这是逼良为娼，逼他上贼船。其实，这件事和吴晗无关，年会论文集是我经手的，入选文章是根据会员提供的文章，按质量选入的。这位教授的文章入选是我提名的，催他交文章也是我催他的，吴晗只认可了文章目录，并没有特别看重这篇文章。这件事之所以使我震惊，是因为历史学会的具体工作都是我做的，清算历史学会的罪行，当然我不能摆脱干系。第一次，在我的思想里意识到，尽管我是小干部，但我的命运和“三家村”联在一起了，在干部的花名册中我已被划入另册，我已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已经卷入历史的旋涡中。不过，李琪还在主持工作，他站得比较高，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但像那位支部书记，说我感情不在这边，当然也可以说我立场不在这边了。

正在这时，即2月中下旬，批吴性质发生了一点转机，中央颁发了《二月提纲》，这个提纲为批判吴晗定了调子。提纲是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成员的文化革命小组制订的，共分六部分，核心问题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提纲认为，“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其中第四部分，明确谈到“左派要互相帮助”。这里说的左派包括邓拓、吴晗，也包括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因为是两种观点完全对立的左派，才有互相帮助之说。不过，实际上姚文元等人是不会承认邓、吴是左派的，而邓、吴也未必愿

意和姚文元一伙为伍。况且，《二月提纲》对姚文元一类的左派并不欣赏，有过尖锐批评。它说：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所说的“学阀”大概就是指他们的。这些弦外有音的批评，在学术界有大快人心之感。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在市委党校，被通知到铁道学院礼堂听传达。首都高校的党员干部不少人是在这里听的。正是在棍子满天飞，学术界广受威压之时听了这个传达，许多教授都松了一口气，称赞党中央英明，制止了姚文元之流的欺行霸市，以及政治恶棍一类的乱棍飞打。有了这个由中央转发的提纲，至少不会像吴晗那样随便被拿出来批判了。据说市委在组织讨论时，邓拓还当了一个小组的召集人。《二月提纲》由于毛泽东在同意转发之后不久，又公开点名批判《二月提纲》，并纵容关锋、戚本禹一伙的批吴文章无限上纲、无限升级，提纲很快就被迫停止执行了。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批判吴晗、翦伯赞升温。他在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地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把吴晗、翦伯赞完全推到敌人一边。随后，3月28日至30日，在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严厉指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样一来，就必然要提高对吴晗批判的调子和声势，邓拓和吴晗处境也更困难了。北京市委为了摆脱困境，必须重新部署战略，反戈一击，即从把矛头对准“左派”，以及扭转这场学术讨论的方向，转到必须公开批邓拓、批三家村上来。

但是，思想感情的转变有时是很困难的，市委批判吴晗、邓拓上纲是有个过程的。据说，《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辑部本来在一月份曾经组织过一次批评邓拓的会议，让邓拓在会上作检查。邓拓检查时，只谈了他的杂文有“厚古薄今”倾向，无非是说写杂文时古代题材的文章多，用古代的史料多。这是事实，但这最多是个学风问题，而且还不是一个太坏的学风。其他所谓倾向、立场，他并没有检查。4月初，市委在停止执行《二月提纲》之后，又组织了一次批判邓拓的会议，刘仁、郑天翔、李琪、范瑾、宋硕都出席了这个会议。邓拓仍然没有违心地检查他的所谓政治问题，而参加会议的人调子最高的也只是说他写了那么多杂文，“到底举的是什么旗，是灰旗，还是白旗。”由此可见，即使北京市委的领导人，也不知道上面到底要批邓拓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批邓拓。至于他们组织这样的批判会，也只能说不得不有这样的举动。况且，刘仁、郑天翔在发言中都认为邓拓是拥护“总路线”的，政治上是坚定的。

不过，市委准备公开批判吴晗、邓拓还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从历史学会开完批吴晗的会之后，回到市委大楼三楼的大办公室，同事们告诉我，在三楼又开了一个小办公室，以便分别思考一些问题。从此，有两三个人的活动就移到小办公室去了。我就一直被搁在大办公室，是无事可做了。这样打发我，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有些人已发现我感情不在这边，但我又是李琪亲自调来的，不好把我打发走。小办公室的人，实际上正在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起草市委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即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见报按语。

4月16日，当我走进宣传部理论处的办公室时，发现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日报从第二版起用了三个整版揭露和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通栏标题是：《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同时登了《前线》、《北京日报》一个很长的按语，调子也不算不高，如把“三家村”主人说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并说：“《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中的一些作品和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其他一些作品，正是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风的一部分代表作。”当然，从政治的眼光看，北京市委和彭真这样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四·一六”的亮相由于中央明确通知，不许各报转载而宣告失败。实际上“四·一六”批判，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此，报刊杂志才公开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廖沫沙，邓拓也就在这一天开始成为众矢之的，市委也在这一天派人宣布停止了邓拓看文件的资格，甚至连参考消息也不让看，从这一天起也就等于失去了自

由。而廖沫沙也是在这一天才知道自己受批判，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也是这一天，他从京郊农村跑回城里，想找市委领导问个究竟，为什么批判他？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想看看有关这件事的文件，可是秘书告诉他“你的文件已经通知停止阅读了。”他回到家里打了几个电话，没有一个打通，他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晚上，组织部长余涤清来看他，也是出于旧日的情谊，其实他本人也有口难言了。副市长崔月犁来看他，也只能劝慰他“看宽点吧！”廖沫沙就这样不明不白被批懵了。我作为一个列入另册的普通群众，记忆中的这一天是无所事事。大楼里一部分人表面上仍旧在上班抓工作，但实际上是抓不动了，市委步入瘫痪状态，许多基层已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抵制了市委下达的各项指示。至于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正在着手写见报的批判文章。当天傍晚，李琪在楼道见到我，问我听到什么反映，我告诉他高校有来电话说反响很大；不过李琪等市委领导等待的当然是中央的反映，中央通知不许转载，也许是他们得到的最不幸的消息了。

二、“反党急先锋”

“4·16”过后，市委大部分干部已有一种预感，觉得市委的天要塌下来。这是因为毛泽东多次严厉地批评彭真，批评北京市委，加上“4·16”市委公开作了检讨，举起了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子，如果毛泽东要放过北京市委，“4·16”当是最好的台阶。中央对“4·16”采取了抵制的办法，国内的所有报刊自然也都不敢理睬北京市委对“三家村”的批判，都奉命不宣传不转载。这对北京市委来说，当然是件天大的事，北京市委领导都面临着灭顶之灾的痛苦，而惊恐不安。早在半个月前，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严厉地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并指责彭真和陆定一“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声称“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个批评分量是很重的，但用了个“如果再包庇坏人”，这好像留了一个活扣，即如果不再包庇坏人，是否就可以不批判彭真、不解散北京市委。那么，谁是坏人呢？浮在水面上的邓拓、吴晗等人，已被当坏人批，自然不会有人再去保他们。这样是不是就能得到毛泽东的宽恕呢？人们只能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等待着。市委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渴望，希望通过自我批评，认真检讨，取得毛泽东的谅解，或许市委就可以不解散了。所以从整个市委的大局出发，北京市委部署了“4·16”的批判之举。这至少寄一线希望，希望通过这一举动扭转被动的局面。但是，毛泽东部署批判吴晗既然是想引出“三家村”，并把矛头对准彭真、刘少奇，就绝不可能让彭真主动。因为，这并不取决于“4·16”检讨是否深刻，而取决于运动发动者对北京市委、对彭真的基本态度。事实上，4月3日、4月5日，彭真都召开过会议，也都作了自我批评，但都被江青、康生等人说成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并在4月9日至12日，对彭真进行批判。按理说彭真当不再存有什么幻想了，那么他为什么要搞个“4·16”批判呢？大约彭真想的是希望自己倒台了，市委能不被解散，这可能是当时他的一个思路。他未必是为保自己。事实上，就在4月16日当天，彭真就失去了自由。

作为一般干部的我，只能看到市委大楼的大部分人处在不知所措之中。特别是4月19日傍晚，彭真匆匆奉命回到市委，宣布他不再管市委的工作了。上面说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以及他的检讨，一般干部并不知道，而今彭真犯错误的说法得到证实了。市委大楼的干部处在极度惶恐之中。一些比较敏感的干部，已经在伺机组织力量，准备反戈一击。大约在4月19日之后五六天，即4月25日左右，市委宣传部有造反精神的人，首先发起批斗李琪，通知宣传部干部全体出席，据说这是市委机关第一次将一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拿来批判。尽管这并不是那一位市委领导的意图，而是个别人的冲动发起的，但在惊弓之鸟的窝里，即使是轻微的风吹草动，也会当成圣旨的。市委干部在彭真时代敬业精神很好，绝大部分干部晚上下班之后，都还在办公室办公或学习，只有少数人是下班就走的。所以，利用晚上发动一次批判会并并不难。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在市委组织批判邓拓写作组时，李琪才正式把我调到宣传部理论处的，

而且由于批吴晗、邓拓的深入，加上我和“三家村”的三位成员都有较多的往来，我很快被列入另册。上班照样，但没有人管我，也无事可做。所以，下班之后我就回到市委党校住处。可是，这天刚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理论处的同事来电话要我立即回部，参加批评李琪的会。我内心震住了，有点不知所措，去还是不去。所有这些，都是我不愿见到，也不愿参与的。

但是，既然是部里的全体会议，不去似乎又不行。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踏上了103路电车。走进宣传部的会议室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其中有一两个态度激烈的，拍着桌子责问李琪和邓拓一起干了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责问李琪写的评吴晗历史观的反动文章是怎样炮制出来的……等等，气氛很严肃，措词很激烈。李琪沉着脸，一句没有吭，有时逼紧了，他就如实地讲几句。看样子他很痛苦，但又无可奈何。从他的神情，颇有点“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突然间，有人点了我的名，要我揭发李琪。大约大家都不愿沾“黑帮”的边，李琪两边的座位都空着，我迟到了，只好找个空位坐下，正好和李琪挨着。让我揭发，我什么也不知道，从何揭发起，但既然已点了我的名，不讲是会犯众怒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都想当革命派，都想在这些举动中争取主动。于是我对李琪说：“我在历史学会好好的，你却把我调到宣传部来，使我处境很尴尬。”我讲这几句话时，李琪一直点头，似乎表示有点歉意。但也有人很不满意的，因为这算什么意见。这次闪电式的、又带有很浓烈火药味的批判，李琪没有想到，但对李琪心灵上却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据说自此以后，李琪再也没有走进市委大楼，我也从这一天开始，再也没有见到李琪。

自此以后，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许多人用一种奇特的眼光看着我，设若有几个人在议论什么，见我走来，他们就走开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杀气腾腾，叫嚷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最后歇斯底里地叫嚣：“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和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一天，关锋化名何明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批判了北京市委所谓“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这两篇文章全面向北京市委，以及《前线》、《北京日报》开火，是解散北京市委的信号。这一天市委大楼像翻了天似的，从办公室到走廊通道，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在议论这两篇文章。因为，在这之前人们以为换一换领导人而已，而今既然把市委说成是黑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每一个干部就必然要牵涉其中，过去所做过的事，包括功绩和荣誉都意味着必须彻底否定，或重新评价。这个触动何等大啊！

记得5月8日这一天，我一早走进宣传部理论处时，处长和干事都站在那里，议论当天报上的两篇文章。这大约是市委大楼公共的议题，他们并不避讳我，其中一位干事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脱口而出：“两篇文章都太偏激，凡事总得讲道理。市委怎么能是黑线呢？”同志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的说不是毛主席的部署，而是野心家的阴谋。此时，一位副处长大约担心这些部下会越讲越离谱，就吼了一声：“现在是如何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问题，离开这个有别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这是衡量是非的标准，顺之昌，逆则亡，谁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随着他的吼声，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此后，在理论处就很少有人再公开议论这两篇文章。因为，想到高炬、何明时，很自然会联想到毛泽东这个威力无比的名字。但是，真正统一思想并不容易，许多现实问题得不到解释，比如把彭真、市委都说成是黑线，无法解释十多年来在市委领导下，北京工农业的发展，更不好解释广大干部辛辛苦苦地工作却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天，市委大楼慌成一团，下属单位打来的电话也不少，他们想问个究竟，但谁又能向他们说清楚究竟呢？从这一天起，市委彻底瘫痪了，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只有个别造反派偶尔组织一个批判某某“黑帮”的会，或者联络几个人，写一两张大字报。我每天照例来上班，每天也照例没有事干。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宣布“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控《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尽管这不是事实，因为当时五人小组成员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五人小组成员都在场，还有列席会议的许立群、胡绳等多人，而且是经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并报毛泽东认可的，当然不可能是彭真的私人炮制。但《五一六通知》既然作为党中央的正式文件通过，而且这个文件又是毛泽东亲自指导制订的，下面就只有遵照执行，不能提出任何疑议。据说后来有资格被通知去听传达的干部，听到那些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黑体字时，都有点心惊肉跳之感。市委够上级别的高级干部在几天之后，就被集中到北京饭店学习这个通知，实际上是要他们承认自己执行了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以及揭发所谓“黑帮”的问题。

市委的一般干部被组织起来，学习报上有关批判市委和“三家村”的文章。5月24日中央正式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平心而论，李雪峰也好，吴德也好，他们大约都只相信旧北京市委彭真等人犯了错误，至于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以及对北京市委的改组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也未必清楚。遇到的头一个问题是首都高校五花八门的大字报，特别是那些对准各校党委的大字报如何处理，况且有的学校大字报已经上街，颇有控制不了局面之势。按照老习惯，求个“稳”字。因此，李雪峰刚到任就到北京大学传达了中央关于这场群众运动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等八条规定，想用这个框框来限制大字报范围和规范大字报的内容和分寸，并按照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部署，立即对市委内部有条件地引导群众写些揭发旧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开辟三楼会议室作为贴大字报的地点，还在三楼会议室门前设了岗哨，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来看大字报。由于有这些限制，加上旧市委的干部对这场运动本来就很不理解，市委大楼出现的大字报并不多。

6月1日晚，中央电台播送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矛头对着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这篇大字报被毛泽东说成是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这张大字报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对这张大字报加以欢呼。这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对全国高等学校的运动起了重要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它像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这一天全国上下都在议论这张大字报，学习和响应这张大字报的造反精神。北京市委大楼也不例外。当天晚上，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的三四个人也在议论这张大字报。我说了市委大楼的运动和北京大学差不多，也是冷冷清清，有的同事则认为都是受李雪峰的八条框框约束造成的。议论之余，勇气倍增，大家认为可以共同写一张炮轰李雪峰的大字报，对运动提几条批评意见。当时我出了一个题目《这是为什么？》，主要是说大字报为什么仅限制在三楼会议室，而且设了岗哨。别的同事也有说学习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还是旧人，也有说李雪峰传达中央的八条是压制运动的八条。一共提了五个问题。平心而论，大家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尖锐点的意见，经过议论之后又删去了。所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不能算有什么分量，但矛头却确实是对准新市委的、对准李雪峰的。大字报题目是我出的，内容是大家凑的，执笔也不是我，张贴出去我也不知道。因为在议论之后，我就离开市委大楼了。据说当天晚上贴出类似内容的大字报就有十多份，而且都贴在楼道里，突破了原来仅限在三楼会议室的框框，搞乱了新市委规定的秩序。

对此，李雪峰非常恼火，6月4日召集市委全体干部在团中央礼堂开大会。李雪峰说刚来几天，你们就反对我，这两天市委大楼出现了一股逆流，认为这当中有“黑手”，对此，要予以坚决反击，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我立即想到前天晚上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但把这说成是反对新市委，说成是逆流，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尽管大字报是对着新市委来的，但也仅仅是提了几

条具体意见而已。因为我实际上已入另册，比别人当然多了一分担心。但既然如此，有什么办法呢？随它去吧！反正是四个人一起写的，当时的情况是能说清楚的。会后，我和理论处的同事走出会场，本想听听他们对李雪峰讲话的反映，但他们似乎谁的心情都很沉重，一句话也不说。我径自走向饭厅去吃晚饭，饭后照例我要从台基厂走到东单公园门前转回来。大约七时左右我回到大楼，在三楼到四楼的楼梯墙上贴了一份大字报：“向我们的好书记李雪峰同志请罪！”下面签名正是和我一起写大字报的三个同事，正面还有一份用两张纸写成的大字报，是检讨他们不该在《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上签名，并说是受别有用心的人鼓动才写这张大字报的。我看后，心里一愣，觉得他们写请罪书不让我签名有点不正常，至于“别有用心的人”明显是指我。我非常生气，想去责问他们。可是，他们三个人，说法如果都一样，我不反被说成是存心抵赖吗？于是，我故作坦然，走进了办公室。几位同事都在那里看报，都装作若无其事，干脆我也装作若无其事，什么话也没说，呆了一会就离开办公室回家了。

第二天一上班，镇压开始了。由党支部出面，召集部里全体人员开会，名义上是学习李雪峰昨天的讲话，实际上是抓反对新市委的“黑手”。支部书记声色俱厉地点了理论处的大字报，接着就是理论处的几个同事哭哭啼啼的检讨，基调是：“敬爱的毛主席为我们派来一位好书记，我们却受人挑拨，在反对新市委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几个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说的。由于支部书记的引导，要他们讲具体些，其实是要他们揭发鼓动写这张大字报的“黑手”。于是，同事们异口同声说是我，不但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大学学生反对李雪峰八条规定的情况，而且提出要写这张大字报，他们都说上了我的当。当时我很生气，觉得这些人太不够意思，为洗刷自己，竟然把我抛了出去，并踩上一只脚。我就说：“大字报是我提出来要写的，北大的情况也是我介绍的，一切由我承担。”显然，我这样一说，同事们开初有点意想不到，后来明显地都松了一口气，支部书记随即宣布：一、小苏的态度很不好，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一点也没有痛心的样子；二、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新市委的态度，别人都写了认罪书，他却连名都不签；三、从今天下午起集体对小苏进行“帮助”。最后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其实，她宣布的决定，我并不知道深浅，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我一点也没有想过。

从6月5日下午开始，集中火力对我进行批判揭发。主要问题：一、站在旧市委的立场，攻击新市委，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部分人写攻击李雪峰的大字报；二、是“三家村”黑店的伙计，和邓拓、吴晗有特殊关系；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揭发很多，一个星期中，一共开了十一次批判会。有的材料很好笑，支部书记一口咬定我和邓拓有黑关系，根据是邓拓说过我是他的老朋友，年龄和地位相差那么多，怎么会是老朋友。其实，邓拓那句话，纯属客气话。有一次在邓拓办公室召开写作组会议，市委有关的部长及宣传部处以上的干部都来了。我是写作组成员，不知为什么来迟了一步。当我走进邓拓办公室时，邓拓站起来并走出来和我握手，说“苏双碧老朋友”。这句话一般人听过也就算了，可这位支部书记却记得很牢。她说，我们市委的处长都不能进出邓拓家，你可以随便进出，难道这不算特殊关系吗！其实，特殊关系并不能说明本质问题，她似乎并不懂得，我和邓拓就是上下级关系，这当中存在着服务被服务的关系，比如帮他查条史料、借本史书，他找我去办要比找别的人去办顺手。要说特殊，我是学习历史的，他对历史有兴趣有研究也可以算是特殊，但这并不黑。另外一件事，是说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简直有点空穴来风。宣传部有位和我年龄相当的年轻人，也是北大毕业的，平时我们关系还可以。“5·16”通知发布前后，有天下午休息时，他约我到楼顶上散步，他主动议论到刘少奇、林彪。我附和他谈林彪解放以后身体不好，长期休养。他说林彪解放后没有做太多工作。他大约怕我揭发他，就先发制人，说我攻击林副统帅解放后不干事。这件事使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他会在关键时刻捅我一刀，而且几乎是嫁祸于人，本来是他说的，我不过附和而已，反过来倒栽我一桩，而且在揭发我时说“比毒蛇还毒，居然攻击敬爱的林副主席。”我没有承认他的指控，也没有作任何辩解。因为我知道，现在需要罗织我的罪名，即使是捕风捉影的材料，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解释无济于事，于是我和每次批斗会一样，在会议结束之前，当主持会议的这位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还年轻，只要认真检讨，吸取教训，将来还是

有前途的。”然后要我表态，我就好像和尚念经似的，每次都这样说：“你们揭发我的材料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真实的我都承认，不真实的请你们核对一下。”

就这样，从6月5日到11日，一个星期内开了11次批斗会，性质也从“犯了严重错误”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散布反动言论”到“恶毒攻击，比毒蛇还毒”，从“三家村的走卒”到“三家村的干将、伙计，”等等。最初还只是这样或那样地揭发，后来就不断有人领着喊口号，什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什么“敌人不投降就要消灭他！”等等，总之，把我完全划到敌人一边了。最后一天，实行梳辫子，即把所有揭发出来的材料，梳成辫子，一条一条摆出来，再加以上纲写成一组几十张纸的大字报专栏，题目是“反党急先锋苏双碧”，贴在一层楼梯正面，进入市委大楼的人都一眼能够看到，可以说是市委大楼最显眼的地方。这也是市委大楼第一次贴一个普通干部的定性大字报专栏。

经过一段猛揪猛斗之后，整个市委机关有几十个人被揪，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排队，把认为最严重的几个向中央报告，说北京市委出现一批反对新市委的反革命分子，为首的共9个人，据说我名列第五，这份报告编号叫《第95号简报》。但是中央对这份材料没有作任何批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正处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自然不会去注意市委那些所谓“反革命”了。这样，他们在公布了我的“罪行”之后，也只好把我撩到一边，不让我参加机关的任何活动，但每天必须到机关来，便于监督，一不老实可以随时训话和批斗。我受此冤屈，心情自然是很不好的，但一想起彭真、邓拓、李琪等人为革命奋斗终生，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我这点委曲又算什么呢？不过，话虽这么说，实际上压力还是很大的。白天在机关里，随时都有可能挨斗，由于革命派必须和我划清界限，我自然被孤立起来，处在十分孤独和寂静之中。晚上回到家里，常常独自一人在痛苦地沉思，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有那么多的错误，那么反动。

俗语说，人到危难关头，才会变得聪明，变得清醒。在极端痛苦的思索中，我产生了三个念头：一、我这样一心一意为党工作的干部，现在居然成了旧市委的大红人，反党急先锋，划在敌人一边。那么，我们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比如土地改革、肃反运动、反右派、四清运动等等政治斗争中，划了那么多敌人，是否也有和我一样，根本不是什么敌人。这使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二、作最坏的打算，蹲监牢我没有想过，但却作了被开除党籍的打算，无非是削职为民。三、养好身体。在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顿饭都吃三毛钱的菜，即甲等菜。每天晚饭后，顺东郊民巷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放风筝，在那种环境下，自然又是另一种心态。机关一般是不管我的，只有要找我们训话或传达什么和我们相关的事，才会想起我们来。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事，突然通知我们集合，大家都到齐了，只少我一人。当有人把我找来时，召集人训了我一通，说我不好好学习文件，改造思想，到处乱跑。站在我旁边的原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被称为“黑帮”的张大中捅了我一下，悄悄地对我说，以后遇到这些事都早点来，不要吃眼前亏。我会意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他的好意。由此我却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怎么我居然也与“黑帮”为伍了，我是不是也算“黑帮”，我想了想，觉得不对，我不是“黑帮”，“黑帮”应是指有较高地位的。不过，当“黑帮”和当“反党急先锋”孰重孰轻，我也比较不出来。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特殊年代被打成“敌人”，压力是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在机关里被另眼看待，失去当干部应有的形象。在外面，则不好理直气壮和朋友聊天交谈，担心人们会用世俗眼光或者对“敌人”理所当然的鄙视来对待我。此外，还有家庭，对自己的妻子也不是太好说清楚的。好在当时她也被卷到“文革”两派的斗争中去，忙得不亦乐乎，她不认为我有问题，也就不太关心我的事。不过在机关当“敌人”也有他的清闲之处，新市委每天上访的人很多，没有犯错误的干部必须昼夜轮班接待群众，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因为是“敌人”，被撂在一边，什么工作都不必参加，一天三顿照吃，照样去天安门前看放风筝。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因

为我的出身好，这一个多月中，我没有挨过打，也没有被抄过家。但是“敌人”毕竟是我所不愿承受的罪名。每当夜晚，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总是思绪翻转，会联想到结局的悲哀，开除党籍或坐牢的痛苦；同时也经常使我泛起种种幻想，希望形势有一天会意外的突变，纠正这种对我的错误批判，以便脱掉戴在我头上的所谓“敌人”的帽子。说实话，我并不仇恨谁，也不仇恨谁把我打成“反革命”，因为这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整个市委，整个社会，都处在发疯的年代，谁也找不到能真正衡量是非的标准，能忍就忍。不过，我很不喜欢市委宣传部这个环境，我是新调到市委来的，正式办手续不过三个月，就把我打成“反党急先锋”，这显然是有些人想踏着我的肩膀往上爬，而更多的人对我由于不了解，也没有必要冒政治风险来给我说几句公道话；况且，有的人还可能因为宣传部有了这样一个对立面，而感到轻松和解脱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敢有别的奢望，只想到有朝一日，能还我一个清白，然后，堂堂正正地离开这里，回到历史学会去。这在那时当然只能是个幻想，但这种幻想却常常给我安慰和力量，并不时地为实现这个幻想而探索。

7月中旬，一个孤注一掷的萌念终于在我脑海中浮现。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给我以启示。按照一般规律，毛主席外出，很久没有公开露面，如今突然露面，说明他很快就会回到北京来。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我要向毛主席申诉新市委把我打成“反党急先锋”。但是，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心中自然会有许多顾虑，什么严重后果都应该考虑其中，甚至包括坐牢、开除党籍都在考虑其中。我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是因为我意识到除了毛泽东外，谁也没有这个力量可以改变这个现状。如果毛泽东根本看不到我的申诉信，而是落到其他什么样的人手中，就只有碰运气了；如果毛泽东看到了，怪罪下来，就自认倒霉了。于是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成一份三千字的长信，主要意见：一、我出身贫下中农，是在党的培养下进了大学的，绝不可能有反党情绪；二、我在旧市委积极工作，是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并不知道旧市委是搞修正主义的；三、我并没有反对新市委，我只是对市委的清规戒律太多提出意见；四、把我打成反党急先锋是没有根据的，我要求平反。写完这封信后，第二天一早我就亲自送到中南海西门的收发室，信封上写“谨呈尊敬的毛泽东主席亲收”。几天之后，大约7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当时新市委的宣传部长李立功和副部长白涛，亲自找到我，李立功说：“你给毛主席的信，雪峰同志看到了，他让我们来看看你。”对李雪峰派人来看我，我很感动。我向李立功、白涛汇报了我写这封信前后的思想情况，以及宣传部把我打成“反党急先锋”是缺乏根据的。李立功和白涛当即表示，“当时批判你，我们也感到不太合适，但没有纠正，这是不对的。”临走前李立功表示：“你的问题比较清楚，是打错了，把一个刚调市委三个月的同志，打成黑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回去向雪峰同志报告一下，由他来决定。”

这个意外的突变，使我对毛主席十分感激，我以为即使他没有看到我的信，别人也一定是按照他搞运动的思路办的。过了很久，才有人看到这封信，上面批了“转雪峰同志处理”几个字。当时的大形势是正在揭发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北京新市委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派工作组进高等学校主要是以北京市委的名义派的。高等学校有镇压群众现象，而市委大楼6·4事件是李雪峰下令镇压的，当然也是一件不算很小的事。但这些当时我并不知道，由于挨整思想闭塞，也怕见到熟人，很少到外面去看大字报。市委派李立功、白涛找我谈话之后，第二天上午八时我刚走进办公室，李雪峰办公室就来电话要我立即到雪峰同志处去。我走进雪峰办公室时，雪峰、吴德、池必卿、马力都在那里，他们迎出来和我握手。雪峰说：“你给主席的信我看到了，很抱歉，我们没有及时掌握这种情况。总之，把你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吴德紧握着我的手说：“你的问题很清楚，是我们错了，我代表市委宣布为你平反，向你道歉。具体做法以及你个人有什么要求，请马力同志和你商量落实。”说话之后深深地向我行了鞠躬礼。我一时不知所措，说不出话来。马力让我坐下，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了两点意见：一是立即为我平反，并在批判我的范围内正式宣布；二是平反之后回历史学会，即回到市委党校参加那边的运动。马力谈了他的意见：一是同意立即平反，并通知宣传部领导及支部，暂不和群众见面，理由是市委很复杂，我的问题他认为是清楚的，其他

人的问题并不清楚；二是平反后是否离开市委去党校，他的意见欢迎留在市委闹革命，但去留由我自定。当时，我认为不论是李雪峰、吴德，还是马力都是诚恳的，正派的，我出自内心的感谢他们，就不想有更多的讨价还价。因为我对市委机关的人并不熟悉，只来三个月就弄得头破血流，它留给我的创伤是沉重的，我似乎也没有必要去为别的人争什么，也就是说我的问题解决了就算了，并不想去扩大什么影响。于是，我同意了马力提出的方案，但坚持平反必须由宣传部支部正式通知我，然后我就离开市委。

当天下午，宣传部副部长白涛和党支部书记正式通知我市委关于为我平反的决定。我决定把有些问题处理一下后，第二天就离开市委。可是，在当时情况下，是无法保密的，傍晚就有几个群众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希望我留在市委闹革命，一张是赞扬我造了新市委的反，是真正的造反派。然而，这些大字报，或者什么赞誉，对我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并不想以此作为敲门砖，而是想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此后的一个月左右，全市就掀起了批判李雪峰、吴德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机关学校都揪斗他们。据说在一次揪斗会上，李雪峰、吴德一起指名道姓向我道歉。随后，造反派有些人找到我，要我出席揪斗会，控诉李、吴对我的迫害。我谢绝了。我说：李雪峰、吴德都是正派人，他们糊里糊涂地把我打成“反革命”，但知错就改，很快就为我平反，还有什么好控诉的。况且，你们现在揪斗他们，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们未必清楚，李雪峰、吴德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就这样，我谢绝了参加所有批斗会，没有因为我个人的事，去揭发任何人。后来北京市委有位领导见到我，说我很宽容、很正派，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对他们却很宽容，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不满和报复。

在市委一共呆了不到半年，见了一些世面，也留下一些回忆，使我领略到在那些日子里，周围的环境压抑多于宽松，恐惧多于安详。大部分人都被扭曲了身心，不断在干着违心的事。一部分人从自发揪斗李琪，到批斗我和给我定案，在罗织罪名编造谎言上是很有本事的；但更多的人是跟风，并不是天生想整人，有点过火也可以谅解，自然不必有太多的计较。在那些日子里，还有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就是一张大字报上透露，市委的工资单上已经没有邓拓的名字，言下之意，邓拓已经不在人世。这虽然几乎是意料中的事，但仍然使我震惊。两个多月前，北大许师谦担心吴晗想不开，我曾经对许师谦说过，吴晗不会自杀，因为他坚信周恩来总理了解他，会帮他说清楚问题的；邓拓则不然，他在看破红尘之后，颇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很容易想不开。如今果然被我说中了，岂不悲哉！

三、逍遥派

回到历史学会，还是联合办公三个学会的那几个人。因为党的关系在市委党校，搞运动都在一起。进入1966年8、9月间，各个单位都在酝酿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市委党校也不例外。当时大约已有人知道我在市委的一段经历，他们出来鼓动，要我竞选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据说还有不少人响应。知道这是一部分人的意愿，首先我不是党校的编制，自然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有时并不是你想不干就不干的，设若有人把你扶上去，你不干也得干，即使让你骑虎难下，也够你难受的。国庆节过后，我想彻底摆脱运动的漩涡，找个地方躲起来，当逍遥派。当时附在联合办公里面的还有一个研究所，一共六个人。归联合办公秘书长管，两边合起来十多个人，都没有太多事做。其中一人小冉，有个女朋友，是个高干子女，敢做敢为，她从北京四中取来一张大串联的身份证明，由她组织四个人去大串联，三男一女。三男就是我和经济学会的秘书李玉平还有小冉；一女就是那位高干子女，后来成为小冉的爱人。按规定机关干部是不能参加串联的，但我既然想摆脱参加机关干部的运动，就管不了这许多了。

我们四人来到北京火车站，串联的学生人山人海，都不要票，有几个红卫兵在那边指挥。

只问我们到哪里闹革命，我们说去武汉，红卫兵指挥我们上哪个列车。由于车门拥挤，又生怕上不了车，我的同事提议钻车窗，三人都赞成，我也不反对，在互相帮助互相推搡下，都进了车厢，座位已都占光了。于是就有人指挥，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先让女同学坐下，男同学轮流坐。红袖章就是权威，车厢里坐的人都听从他的指挥。可是，列车开到丰台才搞清楚，我们乘坐的列车是到上海的，并不是去武汉。四个人面面相视，我说既已成事实，到上海就到上海吧！大家也都赞成。反正本无目的，到哪里都行。睡觉不可能，能坐下来休息一下就算不错，不过，有一点，就是都不会饿肚皮，沿途各大站，常有当地红卫兵来送烧饼、馒头的。列车到达南京站时，我突然想起南京有好几个大学同学，其中有位同学在华东工程学院任教，地点在孝陵卫，何不到那边住两天。经我一提议，大家都赞成，就在南京下车，并在车站找到华东工程学院红卫兵接待车。到了学校，因为我们是北京来的，受到特别优待。男女分别住在两间房子里。第二天由我在华工的同学作陪，带我们参观了南京大学、雨花台、明孝陵等。玩了两天，我们就乘车到上海，许多串联学生一到当地就介入当地的运动，写大字报，贴大字报，贴大标语，支持这派，支持那派，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四人，实际上是混水摸鱼，借串联机会到处玩玩。在上海住了三天，带来的几十元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有的提议先回北京，下一步干什么再说。前后不到十天，我回到北京。当时还有点可能挨批评的思想准备，谁知一回到机关，连胆子较小的哲学学会秘书也找上门来，要我谈谈参加大串联的感受。其实，什么感受，玩玩而已。但感到很滑稽，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管是煽风点火，或者游山玩水，都称作“闹革命”。年纪大的有白发苍苍的，因为教师可以参加串联，他们出来也就名正言顺了；而有的年纪很小，只有十来岁的娃娃也出来“闹革命”。因为大串联是毛泽东支持的，参加大串联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捍卫毛主席的路线，何乐而不为。

由于经济学会秘书老李的鼓动，还有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年轻人，我们又筹备一次新的串联。大约过了十月中旬，北京已是寒意逼人。我和老李加上哲学学会秘书三人，又进行了第二次大串联。这一次，果真是到了武汉，在武汉住了几天，然后到长沙。在长沙，从萍乡安源煤矿传来消息，社科院的几个年轻人已先头到达安源，并在承办《萍矿工人报》。我曾经在安源写过矿史，就极力主张到安源去。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就从长沙来到安源。社科院的同志原先都是认得的，就约我们在安源住下，一起办《萍矿工人报》。几年前在这里写矿史，曾经受到萍矿党委宣传部长和党委书记的热情接待，本想借这个机会去拜访一下；可是，一打听，他们都被打成黑帮，正在被专政，不得探视。我们六七个人办这张报纸，资金靠卖报而来，几个人的吃住由煤矿的工人组织安排。办报方针记得主要宣传当时中央的精神，不介入矿区两派斗争。上面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报纸也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面批刘少奇，报纸也批刘少奇。矿区两派对这张报纸都买去看，都不太反感，所以能维持了几个月。报社设在原清朝末年大臣盛宣怀的公馆，也叫盛公馆，因为这座楼房是白色建筑，所以也叫白公馆。当年安源大罢工，刘少奇、李立三就是在这里和资本家谈判的。报纸的派性色彩由于较淡，常有两派的工人来串门，我们也到矿井参加过劳动。报纸之所以能存在一段时间，是因为符合了“文革”的大方向，至少也是为“文革”摇旗呐喊的，加上报纸不属于哪一派，哪派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接管印刷厂和报纸。我主要负责撰稿，记得用了东锋、金猴许多笔名，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如批判刘少奇在安源所作必要的妥协，但大部分都是不关大局的小文章。因为都是年轻人，而且多少有点事干，日子还过的很快。

1967年初，新年刚过，北京来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我立即回京。电文没有落款，不知是谁拍的。几位朋友一起研究了电文，都觉得有点蹊跷。如果是机关来电，应包括同单位的两位老李在内，而电报却只催我一人回去。反正，不管怎样，既有电报叫回去就回去吧。两天之后，我离开了安源煤矿，回到北京。机关里的同事都说没有打过电报，我也不想去追问了。打开住房，桌面上、地面上都有一层灰尘，证明这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人到过我的房间。

当天晚上，大约8点多钟，突然有人来敲门，进来的是位女同志，是党校学员，因为留校

闹革命，现在是造反兵团战斗队的成员，她姓徐，是北京某厂的年轻工程师。她说电报是造反总部发的，原定抄家的名单中有我，觉得人不在抄家不好，就想把你请回来；又说，在执行抄家中，有人替我说了好话，说我人不错，观点和他们相似，就从抄家的名单中把我的名字删去了。我问她主要抄什么，她说黑材料。我说我在历史学会工作，历史学会的材料算不算黑材料。说着我拉开抽屉把历史学会的会员名单、宗旨、会章等材料交给她。她翻了几页说这不算黑材料，就还给我了。她希望我能站在她们一边，和他们一起“闹革命”。闲聊了一阵，她就告辞了，往后她们的组织由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当总勤务员，过去认识我。他担任总勤务员后，多次找过我，要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声明我是个逍遥派，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但不等于我没有观点，从社会上两大派来看，我是倾向他们的。以后我们互相接触多了，造反兵团的勤务员对我很敬重，常有往来。

1967年春末，社会上两大派斗争激烈。4月27日，党校以校部为主体的一部分学员组成一个队伍，成立“4·27”总部，其中从造反兵团拉出去近一半人。造反兵团处在人心惶恐，担心瓦解的时候，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连续开了几个钟头。深夜，十二时已过，总勤务员，也称兵团司令，亲自来敲我的门，要我出席他们的勤务员会议。我见到会上所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可是都还精神抖擞，好像都在为真理而进行战斗、为真理而赴汤蹈火似的。在另外的几个间房间里，灯火通明，兵团战士都在编写大字报。根据勤务组研究决定，凌晨将要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4·27”总部。对这些我都没有兴趣，觉得昨天都还是一家人，出入相见，今天则已反目成仇，变成两个誓不两立的造反派组织，这样斗下去只能两败俱伤，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要他们掌握大方向，不过什么是大方向，实际上我也不清楚，好像主要是搞联合，搞大批判。议论一阵之后，总勤务员突然提出要我加入兵团，担任顾问，即当军师的意思，我再三声明，我是逍遥派，绝不参加任何组织。但这已经是在他们拟议之中，经他一提出，其他勤务员异口同声劝我加入，借此可以鼓鼓士气。我严辞拒绝，那位姓徐的女士，提议让我考虑一下再定，我立即响应，站起来准备退场，可其他勤务员都没有表态。对于我来说，让我考虑无论如何是使我下台阶的机会。于是我退出会场，回去睡觉了。我始终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选择派组织。

逍遥派有逍遥派的好处。在党校我有许多朋友，其中还有好几个是被错划的“右派”，因为我公开身份是逍遥派，尽管我有倾向，但两边都不希望我倒向对立面一边，都想争取我，而且也不太讨厌我。谁到我这里串门，别人看到了也不会太在意。当时党校有位姓洪的“右派”，因为吃过苦头太多，有点神经质，但人很聪明，外语很好，又喜欢写写毛笔字，也喜欢画画，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他和我认得还是前两三年的事，1963年初，我从北大搬到市委党校住，行李只有一纸箱的书和一个小箱子装衣服，还有一件被褥打成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扛起来很困难。这时一位正在扫地的中年人走过来，二话不说，就帮我提着行李往楼上走。这位热心人，自称姓洪，但放下行李就走了。我看这人长相行为举止不像个普通的扫地工人，但他能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怯生生的来到我的住处。一进门就对我说：“我姓洪，是个‘右派’，不知你介意不介意。”我说不介意，并表示欢迎他。闲谈之间，我知道他是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意见，认为统购统销不容易调动农民积极性而被划成右派的。划了“右派”之后，又不太本分，经常喜欢提点意见，触犯了领导，就从资料室把他调到总务科，做清洁工。“右派”是敌我矛盾，属于专政范围，只能做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

过了几天，老洪来串门又带来一位姓樊的，也是“右派”，毕业于武汉大学，长得浓眉大眼，一表人才，谈吐之中，我觉得他有见识，有学问，就问他怎么被打成“右派”的。他说是在一次学习会上，讲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要照搬苏联的，他讲的主要是指经济建设。这样他就以反对学习苏联被打成“右派”。后来这位樊先生也成了我的座上客。“四人帮”跨台后，此人成了一名很有造诣的党建专家，但这是后话了。当时和洪、樊两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姓许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经在一次讲课时讲了有的共产党员有宗派思想，唯党员是用。

根据这一条，把他划在储安平的“党天下”一类的言论，也被打成“右派”。他们不时来串门，谈话主题基本上都是些报刊新闻，或议论当时学术界讨论的问题。这本来是一般性的往来，但在“文革”中，这样接触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了。有一天，“4·27”总部突然发出一个通令，要所有“右派”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还说有人指控几个“右派”想翻天。这本来不是事实，但如果想挑起争端，不论是哪个组织，并不需要事实。我担心他们会吃苦头，就把可能发生的事和他们通了气，让他们避免了一场灾难。这三个所谓的“右派”，在“文革”之后都得到改正。樊先生成了很有建树的党建专家；许先生后来调到大学，成了一名哲学教授；唯洪先生因在划“右派”之后受过刺激，加上他是学习外语的，当时在党校外语用处不大，他爱好又多，写字、画画、打太极拳都很专注，终没有炼成一门像样的学问，生活有点潦倒。这些都是因为被划了“右派”造成的后果，尽管改正了，也很难挺起身来。

□ 原载《领导者》杂志总第51期 2013年4月

~~~~~  
【书刊评论】

深邃的《迷冬》——一个时代和它的人物

· 赵 诚 ·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迷冬》问世了。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写出的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其前，老鬼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以北京中学生为主线为已引起同时代人的关注；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以回忆纪实的方式记载了文革中在湖南活动的一些人物；近年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作品对文革中受迫害的民主党派和文艺界著名人物行云流水般地描写，让我们领略了那些名人的思想、风采和风骨；还有一些高层斗争中失势者的回忆录，都从特定的视角切入了文革的真相。李辅的回忆录《所思所忆七十年》，记录了亲历的山西文革过程，成为反思地方文革的新亮点。书法家林鹏先生的《东园公记》，对文革中的各色人物有生动的记录，也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文革提供了鲜活的实例。据胡发云讲，《迷冬》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面对荧屏上讲述文革以假如乱真的喧闹，我感到，真实的文革史，将再度拉开大幕！

《迷冬》以“湖城”武汉为背景，时间以1966年夏到1967年夏一年为限，但书中人物的命运则有几十年的跨度。小说从文革开始时，一群受到运动冲击或不是主流派的各色人物，在毛泽东反击“资反路线”后，组成一支文艺宣传队为故事主线，展示了那一年中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在这个运动中的处境，态度，作为，特别是刻化了那个时代一些代表人物的特有面貌。

小说更深的背景，是中共建国后前十七年因毛泽东的统治积累下的官民矛盾、不同群体的矛盾，在高层斗争下或说在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下，充分地爆发出来。简单地说，运动一开始，毛泽东进行全国动员，在北京大规模接见红卫兵，让青年学生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串连，让学生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些人响应号召，向地方和单位领导提出批评意见。但一直位居领导地位，惯于压制不同意见的大小实权派干部，重操五七年“反右”的故技，枪打出头鸟，对敢于表达批评意见的出头椽子进行严厉整肃。同时，抛出领导层里相对边缘者的干部，作为应付运动的祭品。《迷冬》女主角夏小布的父亲，省委党校校长，就是该省领导抛出来的干部。在地方权力内斗和派系恩怨中，他被打倒而自杀身亡。而居于台上的高官子弟，则以接班人的面目，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大打出手，抄家、打人乃至杀人，对“黑帮”和“地富反坏右”制造了红色恐怖，甚至在一些地区以消灭阶级敌人的名义把所谓“地富反坏右”整批全家屠杀，其血腥暴行至今不能见诸官史。

文革第一轮风潮之后，毛出于高层政治斗争的需要，要对这些从中央到地方一贯正确的领导人进行打击，1966年11月提出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迫害革命群众罪魁祸首。马上，在运动中因反领导受了整肃和十七年中感到受压抑的一批群众，组成了造反派对这些的领导干部进行批斗，而十七年中受到重用和提拔表彰的一些群众，则拥护这些被毛称为搞“资反路线”的领导干部，全国因此大体上分成造成反派和保皇派两大组织群体，各派中又有不同的派别。这些组织中，涌现出了一批很有政治才能和气魄非凡的人，《迷冬》中的中学生羊子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造反派人物，他出身红五类，人很好，有情有义，在毛泽东号召下参加文革，运气和才能使他成了一派领袖，他有政治头脑，有组织才能，有革命者的魄力，历史倒退60多年，他也许就是湖城的焦达峰。后来出于政治的需要和某些权势人物的个人憎恶，简单把地造反派都说成是坏人，进行了组织或司法处理，把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都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上，没有从体制上深入地找原因，这显然对此类人不够公正，也是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

《迷冬》中还看出，那个时代对青年的教育就是政治洗脑，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简化成黑白两类，非白即黑，童援朝一个同学，一个码头工人儿子要入团，有人检举他父亲入过青红帮，这个人即要被“组织”拒之门外，后来童援朝奉命去外调，这位码头工人的党支部书记对他说，“一个扛码头的普通工人，能干什么坏事呀？还不是卖苦力挣钱养家，那时候，你要在码头上混一份差事，都要加的，我这个当书记的，也加入过啊，那时候，共产党罢工闹事什么的，还得要青红帮暗中帮助呢”，童回去向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后，这才使这个同学入了团。社会生活的复杂和共产党执政后“大简化”理论的灌输，是那个时代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迷冬》同时也描述了那个时代是以血统看人，政治血统是一个人的身份，是人生的最重要的部分，即首先是“有成份论”。政治教育和血统论使人们对问题的看法，简单片面，同时，阶级仇恨的煽动，使青年和众多国民缺乏理性，致使很多人在文革中因此犯了很大的罪过，致使很多人惨遭迫害、蒙冤受屈。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轮到你受迫害时，没有讲理的地方，无论是谁不能例外，舒惠舒叶姐妹的父母之死即是一例，这与政治洗脑和仇恨教育是分不开的，也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不讲人权，不讲法律惨无人道行为却被施害方视为革命行为，最高当局和执行这条教育路线的人都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当然，当事人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今天我们可以再往深问一句：难道以革命的名义就可滥杀无辜，践踏人的尊严，罔顾民众福祉吗？

《迷冬》对造反派的客观描述和对他们命运的勾勒，也看出作者对这一问题是有着深邃的观察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党天下”的长期严密封闭的社会里，突然在高层斗争需要下，为社会打开了一个短暂的、只要不反毛和毛的意识形态就可自己结社、办刊的特殊时期。当然，这绝不是真的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时期，遇罗克为办的《中学生文革报》为反对血统论的言论丢了命，杨小凯为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而进了大牢，张志新因为反对打倒刘少奇而经受了百般凌辱后惨遭杀害。但这个时期毕竟使社会出现了一些松动，国家机器在毛泽东支持学生的群众造反情况下，对向地方各级党组织造反的不同派别的学生和群众组织不知如何运作了，所以为有政治才华和各种才能的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在这段时期，许多群体都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活动，无论是地方的军方的当权派，还是被整肃的右派、被下放“62压”和合同工等，一切可以借毛泽东政治口号为自己伸张利益的人都出来进行了活动。但这一切都在毛的掌控之中，只要他一声令下，随时可让一个组织或某个人立即完蛋。《迷冬》中，多多小姨夫妇，就是高层下令被秘密抓捕的，连旭的无线电天才也被这个专政机器彻底击垮。在毛泽东对一切感到掌控自如的时候，突然使毛意外的是，他没想到他的文革主张，在湖城这个地方上受到军队和地方干部的顽强抵制。这就是，小说中1967年7月的湖城，在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好派对屁派（造反派）的彻底围剿。虽然毛当时是扭转了湖城局面，但最终毛的乌托邦路线从根本

上是反文明，是把国家拖进更深的灾难，让许多曾经当权的人，也尝到了被人迫害的滋味，因此遭到地方大军区的抵制，最终不得不有条件地和他的干部队伍妥协，在毛死后，他的文革也就彻底破产了。

今天有些人利用毛的文革旗号反腐败，蛊惑人心，其实就是利用人们怀念毛曾一度允许群众斗争那些拥有特权和整人权的干部。当然今天的社会腐败是有目共睹的，但用什么方法约束权力滥用，是用宪政民主和自由人权，还是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这是需人们认真思考的，前者这是人类文明唯一成功的约束权力的办法，无论对哪一方都是最好的选择。后者尚无成功的先例。即使是毛时代，腐败也广泛存在，政治腐败是说假话，整人，放卫星，生活上领导干部和民众是有着很大的等级差别，文革中，李庆霖向毛泽东反映知青生活困难问题，提到地方官员招工走后门，毛泽东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只是当时物质匮乏，官员们不能像当今这样奢侈，但绝不是一片净土，多少女知青为了返城、招工、入学等向当地官员，甚至是村干部献上了贞操！文革真的那么美妙吗？

《迷冬》，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不能代表全部的“高干子弟”的群体，如果说夏小布和连旭是这个群体是的一类，但他们中更多可能是梁家老二那类人，作者对这个群体的这类人的描写，仅仅是让梁家兄弟露了个面，但也让读者看到这是一批对自己的平民同胞很不屑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红朝贵胄，想靠血统世袭权力，在“红八月”中他们作为红五类的代表风头出尽。后来在文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或成了保爹保妈派，或退出运动，其中一部分人也因父母的受打击受到当局的不同程度迫害。后来，他们这个群体对“红八月”的历史百般回避，其中不少人已进入了精英层。我不能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而否认他们其中一些人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优秀才能，我不赞成搞新的血统论，现代政治也有政治世家，但公众人物应该诚实地面对历史，以赢得国民的认可。同时，《迷冬》也让人们通过文艺队的钱氏兄弟看到无论怎样改朝换代总是在底层社会的鸭子沟居民的实际社会处境。

从《迷冬》还可看出，凡是人类文明的精神瑰宝，无论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都是那个时代要进行禁锢的，不准普通人接触，从那个小小的文艺队的演出来说，在正常场合，凡是能有吸引人的作品，多是以真正的艺术水准为底蕴的。苏多多在船上的演奏被誉为“帕格尼尼再世”的19世纪西班牙小组提琴大师名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感动了那么多人，但他却只能谎称这是一首名为“塔吉克人民想念毛主席”的曲子、黄为仪的演奏倾注了真情实感，所以能如泣如诉，钱氏兄弟真正的师傅是有留学背景的中央乐团的管乐高手，因政治迫害流落到鸭子沟隐姓埋名，以售卖自制卷烟为生。从苏多多从统战部盗书，到夏小布在连旭家顶层偷看书，都说明，真正给他们理性、是非感，和冠之以“颓废”的朦胧的人性理想追求，是这些人类的精神瑰宝。从屠格涅夫到罗曼罗兰，从俄罗斯古典文学到法国文学，确实给了那一代人中一批人以精神的滋养。当然还有文革中流落到民间的一批灰皮书如德拉热斯《新阶级》，绿皮书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汤因比《历史研究》等都给了那一代文化荒漠中的青年们以滋养。

一般的极权社会，性都是一个被禁忌的话题，奥维尔在《1984》年描述到老大哥控制的社会里，有一个“青年反性同盟”。其实人性是不都改变的，于是那个社会就变成了高干可以看《金瓶梅》，小青年则不许谈恋爱。恋爱成了不光彩不道德的恶行。文艺队中的青年们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的。在政治斗争中，用两性关系抹黑对方也是一个常用的手段。但爱情与性，无论在朝或在野，无处不在。而因情爱曝光受到空前精神压力的秦珊珊，苏多多给了她19世纪美国小说霍桑的《红字》让她阅读，读后秦珊珊在精神上认识到爱和情的正当性，再次突出了那个时代文明和反文明、人性和反人性之间的张力。

《迷冬》中苏多多的舅舅是一个把苏多多引上音乐之路的人，这个天真的人，对吉它的痴爱，他的艺术才情在那个按乌托邦理念改造人性和整齐划一的社会里，是一个多余的人，更何

况他对个性的追求，比苏多多“颓废一万倍”，在那个社会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邪恶。他的性倾向，那个时代就等于犯罪，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把性倾向是否等同人的善恶，这个古老又现代的话题，再次摆到了世人面前。

毛时代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用革命的伦理压倒人伦的伦理，对不是革命者的子女，特别是所谓反革命的子女，一方面对他们血统歧视，一方面又叫他们背叛父母家庭，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很多家庭，子女与父母断绝亲情，顾准至死也未能见子女一面，《迷冬》中，宫小华和有右派身份的父亲宫克父女之间亲情的描述显得格外感人。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批在历次运动中被整的文化人，无论他们自身有何种个人的问题，但他们曾经是有理想，也献身过催生共和国的活动，但最后都被毛时代一个接一个的动动整得成了牛鬼蛇神，虽然执政者背弃了向中国人民的承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这些人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宫克就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迷冬》中每当两派斗争到了关键时刻，他的诗，总是那么地深怀理想而感人地出现在街头，他私下对时局的分析，总是那么老道，作者这样浓墨着笔，想来有生活中的原型，曾在那个时代对作者精神上进行了启蒙，全国不止湖城一地有这样一些人，成了一些青年的精神教父。

《迷冬》如果有什么不尽意处，我同意姜弘夫人的看法，恐怖的红八月，勾勒的可再全面深入一点，我也不希望书中过多血腥，但那个岁月是血腥的。其实文革中又有哪个阶段不血腥呢，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从遇罗克到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们哪一个不是那前三十年的历史呢？最后，回到《迷冬》作者的写作意图上，我根据作者的作品，看到作者希望的是我们全体国民对那个时代和岁月的反思，而不是挑起新的仇恨，套用波兰米其尼克的一句话“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同胞之间不应再进行血腥的斗争。但用什么办法扼制人性中的恶，启迪人性中的善，我看体制和理念是重要的问题，祈盼社会各方在真相与反思的基础上宽恕与和解，使中国走上文明大道。

2012年10月30日

□ 原载：胡发云新浪博客

~~~~~

【千秋功罪】

恩来其人——命运、性格与文革
——读《周恩来的政治生涯》

• 白 小 •

〔内容提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芭芭拉·巴努茵与余长更所著的《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弥补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周恩来只谈功勋不谈过失而造成的认识片面性。作者将周恩来的一生概括为“以献身一个事业开始，侍奉一个人结束”。时至今日，周恩来无疑是党内领袖在国内外被一致肯定的正面形象，但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曾说，周恩来在文革中，也做过错事、违心之事。细究周恩来在文革中得以幸存不倒的原因，不仅在于他难以替代的工作能力和善于交际的才干，更在于他妥协克己的性格。他极大的扭曲自己、臣服他人，为此做出违心的言行，而得以保全自己。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性格在文革中走向两个极端，而性格成因也成为毛发动文革不可忽视的因素。〕

他是日理万机人民的好总理，是谈笑风生的谦谦君子，是叱咤风云的外交说客，是地下党

情报网络的最高头目。这恐怕是大多数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周恩来这位传奇人物的刻板印象。人们称赞他的才能，感恩他的好心，然而迄今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一定片面性，只谈功勋不谈过失。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终生活跃在政治斗争、权力较量中心舞台的周，难道真没有做过错事、违心之事？为什么所有反对过毛的人都被整过，唯有周一人始终不倒？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读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芭芭拉·巴弩茵、余长更所著的《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后，这样的问题或许有了答案。

本书的作者之一芭芭拉·巴弩茵是瑞士日内瓦国际政治研究所博士，长期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另一作者余长更真名冉隆勃，从1952年到1974年一直在外交部任职，对周恩来有近距离观察，1980年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工作，冉隆勃退休后与芭芭拉合著此书。书中很多资料来自国外，但由于中文出版受限，本书最先是以英文出版，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的中文版由马继森翻译。尽管书中也有些与史实不符之处，如对中国高层决定出兵朝鲜战争的细节显然与沈志华的研究不同，但总体感觉比较靠谱，用译者的话说就是能被其他著作所证实，能经得住时间考验。读罢此书，可以了解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周恩来，也对中国共产党和文革时期的历史有了进一步认识。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用作者的话可以概括为“以献身一个事业开始，侍奉一个人而告终”。周所献身的事业就是他从小立下的誓言，往大里说是民族崛起，往小里说是成为推进历史的伟人。这大小两个方面始终贯彻在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几乎可以解释周为民族复兴奔波，为自身政治生命延续所做的一切努力。周的理想是很早就确定下的。上学时，周就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也说过要“成伟大人物，克服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在他与小学同学郭思宁分别时，也赠送写有“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字条。可见周是自小立下雄心壮志要将个人价值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涂有一腔热情，难成大器。周幼年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思想以及“忠君”的意识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体现在他后来处理与毛的关系上，他甘为人仆），为他日后的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周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在严修、张伯苓的影响下接受新式教育，后来到日本、法国留学，这些教育经历无疑使周拥有广阔的视野。通过对新思想的学习，他对民族命运也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些都为周恩来打下深厚的基础。然而真正让周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绝处逢生的是他经世治国的才能、强大的交际才能和他独特的性格。

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十分强大，基辛格评价周恩来机智幽默，谦虚谨慎，记忆力强，亲和力强，有人格魅力。周的过人才干除了个人非凡的天赋外，也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周的祖父任过知县，但到周出生时，家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周的叔父膝下无子，周从小过继到叔父家，十来岁时，养母、生母纷纷过世，叔父多病，生父长年在外，周是长子，当家的担子早早就落到他身上，周自己曾说，他十多岁时就知道当家苦。柴米油盐要他操办，他经常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以贴家用。还要摆平里里外外各种关系，这为他后来办事周密谨慎、善于察言观色、处理人事打下基础。他在天津时办过报纸，在海外留学时宣传过革命思想，成立、参加过各种进步组织，回国后组织过学生和工人运动，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南昌起义，参加过长征，经营过一个高效严密的白区情报网络，可以说他是中共史上斗争和领导经历最丰富的人之一。1931年四月，周负责上海地下党情报的助手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顾不堪忍受毒刑，欲向蒋介石坦白地下党组织重要信息，以换取蒋介石的宽大处理，周的情报人员截获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周随即命令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更改暗号，变换联络方式，做好隐蔽，于是顾向蒋介石提供的情报在上海没有发挥用处，但却使江苏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惨痛打击，为了报复，周下令一夜间杀死顾全家老小15口，并派人当街枪杀了抓捕顾的国民党特务，以此向外界宣示中共并未因此失去战斗力。可见周在斗争中也有其果断、毒辣的一面。过

人的才干和丰富的经历，使他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因此他几乎可以适应各种情形的工作，可谓“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以一当十的过人才能自然让他成维护政党秩序、驾驭国家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挨整了，毛仍需要精明能干的周为他来为他撑着烂摊子，尽管这还不是周幸存的关键原因。

周恩来是中共的“公关大师”，善于处理各种微妙关系。这是他在党内又无人替代的特点。周生于1898年3月5日，双鱼座，双鱼座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会说话，善于驾驭谈话气氛，这一点很符合周。周热衷于社交活动，在日本求学时，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参与各种社交组织活动，积攒人脉，宣传革命思想，以至于他学习日语的时间有限，考取日本大学有困难。他几乎可以和各种阵营的人交朋友，不论是国民党高官、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界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外国记者他都能轻而易举的拉上关系。他处理人际关系的特点是，能主动妥协，善于向对手示弱，审时度势的调整甚至扭曲自己以适应对方，使得他能非常轻易的和他人建立共识和信任。他很善于揣摩他人的心思，投其所好的进行沟通，因此他在国共谈判、西安事变、建国后外交等各种对抗性的交流中，能发挥重要的斡旋、调停作用。

周恩来的性格也是周在政治上的立身之本。总理的位子一坐就是二十余年，这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是不可想象的，换了别人恐怕早就人仰马翻。而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妥协。妥协其实是中性的，因为性格中任何特点都是有利有弊的，优点是缺点的延伸。妥协不是投降，而是有节制的让步。但周恩来的妥协能让步到什么程度却可以随着形势需要而调节。周曾说：“为了我们的革命，我们可以扮演如夫人的角色，必要时，甚至可以当妓女”。这是一种强大冷酷的克己能力，可以使自己表演出有违本心的言行。性格是中立的，但违心的言行却要承担价值后果。周在政治上得以成为“不倒翁”和他妥协克己所做的违心言行不无关系。他一直小心处理与权力顶峰的毛之间微妙的关系，文革期间他不仅需要向毛表示出绝对的顺从，还需要向得势的林彪、江青妥协服软。他骨子里是反对文革的，他想要促进经济、不让阶级斗争干扰国家发展，他也尽量一有机会就去做这些事，但是疯狂的时代，未必会有太多这样的机会，杀人不见血的政治斗争中要想生存就得服从，周在因贯彻自己意志后遭到批判差点丢掉总理职位后立刻就放弃了自己的本心，为了表现服从，他积极做出三种“表演”：坚决拥护毛，大赞毛永远正确；积极认错，检讨自己；落井下石。文革中，当学生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抓走后，周曾亲自去解救王光美，耐心向学生做思想工作，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周放弃了王光美，当江青正式宣判王光美时，周恩来第一个高喊“打到美国特务王光美！”。在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陈伯达等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后，周一再不厌其烦的表示赞同毛主席的英明决定，承认自己对形势认识不清犯了各种“错误”，严词批判被打倒的人。正这是这三种精心的“表演”，让毛感受到周的忠心。毛或许知道周会有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毛相信了周的忠心。因为只要毛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周就会毫无保留的支持毛，而毛也多次在周遭四人帮刁难时保护周。因此，全心全意的效忠毛，侍奉毛，成了周在政治上长期不倒的关键原因。

如果将周和毛的性格做一对比，可以发现周和毛的性格是截然相反的，而文革时期，这两种性格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如果说周的性格是妥协克己，那毛就是不妥协，不克己。解决问题时周是完全向内发力，压制自己的本心，让自己去适应别人，而毛则是完全由着主体意志，反复无常，他要向外发力，要别人妥协，要别人服软，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要将对手打垮，“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两种性格走向极端都会产生有害的结果，不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发力都是偏执的。佛教有云：“立地成佛”就是说既不向外，也不向内，这样才可以守持人的本心，不过分痴迷。然而对政治家来说，这种“立地”的自然状态很难坚守。通常要做“人”成不了事，成事做不了“人”。搞政治的人哪有不痴迷的，要在残酷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雄心，不得不承受面对人性、良心、道德伦理的拷打的代价，就像周下令杀光顾顺章的全家人一样，这是血淋漓的谋杀，但却成就了一个情报组织和党的安全乃至革命的胜利，所以周和毛这样的人很难完全跟随一颗平常的“人”心，而是用权力把心牢牢囚禁起来。周恩来病重卧床时曾对邓颖超说“我

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说。”很多话周至死也没有说，周的健康恐怕也与他有话不说憋着有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周在文革中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他是有数的，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他是清醒的，只是在文革那种杀人不见血的极端环境下，就是想做烈士也未必能如意，周不做烈士，他要始终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于是他只能将自己始终向毛看齐。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周一生最后几年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关于周恩来的研究，绕不开毛泽东，所以有必要分析下毛发动文革的心理成因。文革的成因十分复杂，但毛的性格和心理必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毛的生日是12月26日，摩羯座，摩羯的性格通常被认为是雄心、深谋远虑、隐忍有耐心、但自卑缺乏安全感，报复心强。单就隐忍有耐心这一条来说，似乎与毛不符，但实际上毛的性格和心理与对摩羯的描述颇为相似。毛喜欢秋后算账，有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味。在早期的中共核心领导层，毛一开始并不起眼，既没有读过大学，又没有留过洋，身上又保留着很多农民的生活习惯，这些常被人拿来说事儿，和周恩来等高学历、海龟、共产国际正规军等“高帅富”领导相比，毛颇有几分“屌丝”意味。但“屌丝终有逆袭日”，战争给了毛机会，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毛指挥着共产党取得一个个军事胜利，一步步夺取政权。这个过程是毛在党内逐渐获得最高权威的过程，也是逐渐被神化的过程，当然这其中还运用肃反、延安整风等一系列洗牌活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其他党内领导在这过程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毛的独断和他们顺从不无关系。毛登上了权力顶端，战争的胜利让毛获得绝对的自信，他在军事上无人能及。然而建国后，在国家治理方面，他并不总是在行，党内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比他更善于治理国家，更熟悉经济生产的规律。和这些人相比之下，毛又有几分“屌丝”意味。然而此时的毛已经被权力惯坏，他变得十分敏感，没有耐心，他已听不得反对意见，容不下批评声音。这不是单纯因为度量，也是因为他的自卑和他要强的心理。毛是自卑的，他可以承认别人某方面比自己更专长，但这种专长如果转换成威信和影响力上的优势时，毛就很难服气。因为毛又是要强的，他是最高领导，他曾带领全党打下江山，无人能敌，他已经被神化，样样都要像神一样绝对正确，怎么能容忍自己在治国上不如别人，怎能容忍他人挑战权威。可是他又确实不善于治国，他在心理上不能容忍自己不如别人。这种唯我独大的心理有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子，更有脆弱的自尊心好胜心与自卑之间的矛盾。矛盾使他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之中，也将他拖入极端的偏执和心理失衡，为了维护内心的平衡，他向外发力，他用绝对的自负来抵消自己的自卑，采用了他最擅长的方式“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启用打手政客，整垮对方，消灭对方，成全自己，将民族拖入深重的灾难之中。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毛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干过的最牛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领导中共革命胜利），因为从心理层面看，这两件事都是打垮所有反对自己的人为手段来证明自己的强大。然而真正强大的人不需要外物来证明，不自信的人才会以样样都好来证明自己，满足自己。毛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斗争，他确实最善于斗争，斗争中他是绝对的强者，他乐在其中。正如他自己所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 原载：共识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